

韩愈教育思想的儒学基础

吴涛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儒学思想包括道统观与心性观两个部分, 并是其教育思想的来源和基础。在道统观的基础上, 韩愈作《师说》, 大力倡导师道尊严; 在心性观的基础上, 韩愈提出了以教传道、育才兴国、因材施教、兼采众家等一系列教育思想主张。

关键词:韩愈; 儒学思想; 道统观; 心性观;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 (2011) 05-0030-04

韩愈(公元768-824年), 字退之, 河南孟县人, 世称昌黎先生、韩吏部,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学上, 他是古文运动的领袖; 在思想上, 他是复兴儒学的先驱; 在政治上, 他是直言忠谏的表率。故苏轼撰文赞其曰: “文起八代之衰, 而道济天下之溺, 忠犯人主之怒, 而勇夺三军之帅。”^{[1]634} 同时, 韩愈在教育上也曾功绩卓著, 堪称优秀的教育家, 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韩愈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 在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方法, 以及人才的培养与选拔等方面, 均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而且这些真知卓见直接源自于韩愈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 是其儒学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因此, 深入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及其与教育思想的源流关系, 是进一步认识韩愈其人其学其教的必要前提。

一、韩愈儒学思想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内容

韩愈的一生历经代、德、顺、宪、穆五朝, 恰逢安史之乱过后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时期, 封建王朝的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忧患与希望并存的复杂局面。与之相应, 许多仁人志士纷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 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并积极进行改革实践。但是, 如何重新树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再次形成适合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 才是这一时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而韩愈的过人之处, 就在于他恰好察觉到了时局的症结所在, 遂以重建儒学道统、辅佐王室中兴作为自己安生立命、为学从政的起点与归

宿。从儒学的全部发展历程来看, 韩愈上承孔、孟、董, 下启程、朱、王, 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先秦孔孟儒学发展到了西汉董仲舒那里, 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但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 又形成了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隋唐初期, 统治者虽有意提升儒学的地位, 但却未能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于是, 为了复兴儒学, 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韩愈始终以尊崇孟、融汇百家、辟佛抑老为基本立场, 并通过在天道观、神鬼观、道统观、心性观、圣贤观等方面的理论建树, 为儒学的复兴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其中, 最能体现其儒学思想的, 是道统观和心性观两个方面。

(一) 道统观

韩愈所谓的“道统”, 即是指儒学的先王之道, 亦即孔孟的仁义道德学说。韩愈一生尊孔尚孟, 尤其对孟子, 更是推崇备至。他在《读荀》中声称, 自己是“读孟轲书, 然后知孔子之道尊, 圣人之道易行”, 并且在文末盛赞“孟氏醇乎醇者也”。^{[2]36-37} 又在《送王秀才序》中指出, “孟子师子思, 子思之学, 盖出于曾子。自孔子没, 群弟子莫不有书, 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故吾少而乐观焉”。^{[3]2776} 由此可见, 其尊崇之心溢于言表。然而, 较为集中地表达了韩愈的道统观的, 乃是《原道》一文。他在文中不仅阐明了自己的“道”, 而且还对千百年来的儒学道统进行了追溯。他说: “斯道也, 何道也? 曰: 斯吾所谓道也, 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 舜

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18}韩愈如此强调儒学道统的目的有三：一是突显其作为孔孟儒学正宗继承人地位；二是欲以儒学统合各家学说；三是辟佛抑老。对于各家学说，韩愈认为，荀子“与孔子异者鲜矣”；墨子必与孔子互相为用；黄老刑名“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而对于佛老盛行，尤其是君主佞佛导致儒学地位动摇的状况，韩愈真可谓是痛心疾首，宁死也要力挽狂澜。他在《与孟尚书书》中言到：“汉氏已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寔以微灭，于是时也，而唱释、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死万万无恨！”^{[2]215}韩愈道统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仁、义、道、德。在《原道》中，他对这四个方面分别作了界定，即“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2]113}具体言之，韩愈的道统说则体现在如下方面：“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2]18}

（二）心性观

韩愈的心性观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治心，二是辩性。所谓治心，即是《大学》中所说的“正心诚意”。韩愈十分推崇《礼记》中的《大学》篇，多次引用其中观点并加以系统论证。如他在《原道》中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2]17}韩愈在这里将自己的治心与佛、老的治心相区别。他所讲的治心，是一种“有为”的治心，入世的治心，以求达到

修己治人、齐家治国的目的，而不是拒斥三纲五常，只求“清静寂灭”的佛老之道。同时，这种治心还体现了一种“王道”，它是靠提升内在修为，完善自我道德，进而实现平天下之目的，而不同于法家那种完全依靠严刑峻法等外在约束来实现统治的“霸道”。

所谓辩性，指的是韩愈将前人含混而论的人性，分为性与情两部分，并将性与情各分为三品。他在《原性》中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之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视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动而处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视其品。”^{[2]20}韩愈认为，人的品性是由先天和后天两种因素构成，因先天而成的为性，随后天而成的为情。换言之，在韩愈看来，仁、义、礼、智、信是人先天具有的，虽因人而分善、中、恶三等，但终归是符合人性的；而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后天形成的，并且是时而表现适中，时而表现过头或不及的。

二、韩愈儒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的源流关系

韩愈入仕以后，曾经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在担任地方官时，也非常关心教育事业，先后写下《师说》《进学解》《子产不毁乡校颂》等教育名篇。在这些名篇中闪烁着韩愈教育思想的光辉。然而，如前所述，这些思想并不仅仅是韩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而是他的儒学思想在教育中的体现，是他以“新儒学”培养统治人才的理论升华。

（一）道统观与尊师重道思想

韩愈的尊师重道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贞元十八年为李蟠所写的《师说》当中。在《师说》一文中，韩愈为教师界定了一个至今仍被人们称

道的概念“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2]42}

对于此，曾国藩曾言：“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4]231}

而韩愈自己则认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2]253}仁义者“为道易明”，“为教易行”。^{[2]118}可见，韩愈所传之道，乃孔孟仁义之道；所授之业，乃修己治人之业。为使此道此业后继有人，不至旁落，韩愈不辞辛劳，“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2]45-46}

对于道与师的关系，韩愈认为，“闻道”、持道乃是为师的基础，正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对于那些“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他则认为那是“小学而大遗”，“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2]42-43}由此推知，由于韩愈极力推崇儒学之道，欲承之传之，所以自然强调师严道尊；再加上当时佛老盛行、人心不古、师道不传，所以，他“不仅批评了这种陋习，还勇于为师”。^{[5]323}同时，韩愈对于师生关系问题的观点，也源自于其自身的道统观，并且再次印证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论断。他的两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无常师”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2]44}在韩愈看来，师生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师生各自处的地位，而是谁先“闻道”、持道。先闻道者可以为师，未闻道者从之受教。故此，韩愈不仅持道以教，做到身教与言教结合，而且对于那些未闻“道”，而又“耻于相师”的人，韩愈也给予了批评。

(二) 道统观、心性观与基本教育主张

1. 在教育目的上，主张以教传道

韩愈以建立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在教育上必然以传授孔孟仁义之道为最主要目的。同时韩愈的这种教育目的观，也正是对孟子明人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有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6]118}孟子的明人伦，即为明“五常”，使父子有仁，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韩愈也认为，仁义礼智信乃是待教而移之人之天性。可以说，韩愈不仅传承了儒学的道统，也发扬了儒学的教育思想。

2. 在教育作用上，主张育才兴国

韩愈在《原道》中指出，儒学道统“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可见其认为，汉唐以来的道统与君统无任何关系，而是由大臣和士人中的圣贤来担当。因此，为延续道统中兴大唐，就必须通过教育培养出大量能够“修己治人”的贤才。因此，韩愈不仅呼唤“伯乐”、自当“伯乐”，识才、举才、用才，而且还积极培育人才。

有学者指出：“史称韩愈独有接后辈名，奖掖后时。有唐三百年，能得此声誉者恐怕只有韩愈一人。”^{[5]341}不仅如此，韩愈还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要求“国子监并依六典”，“四门馆亦量取无资荫有才业人充”，并“请准新捕人数量加支給”，^{[2]589-590}以求达到育才兴国之目的。

3. 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

韩愈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因材施教，既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同时也是其心性观在教育上的体现。他在《原性》中说：“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但又说：“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焉则少反焉，于其也混”，“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22}等等，由此可见，在韩愈看来，教育的真正对象是那些具有中等品性之人。正是因为人的性、情各异，所以，韩愈主张要因材施教。

4. 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兼采众家

韩愈强调儒学道统，不仅是要抬高儒学的地位，还要以儒学融汇各家学说，不仅自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2]45}“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2]164}即使是自己十分推崇的孟子，对于其讥墨子“兼爱”“非攻”的观点，也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

三、小结

正如陈寅恪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键人物也。”^{[7]332}

无论是作为思想家，还是教育家，韩愈都是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无论是其儒学思想，还是其基于儒学思想之上的教育思想，都为唐代乃至后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下转第41页)